

21世纪通识教育系列教材

中国传统哲学通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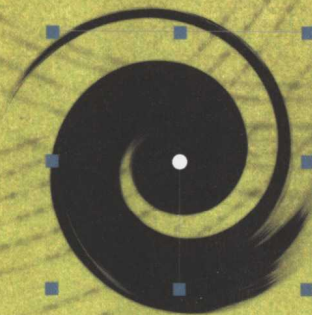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1世纪通识教育系列教材

中国传统哲学通论

ZHONGGUO CHUANTONG ZHIXUE TONGLUN

宋志明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哲学史研究

中国传统哲学通论

王德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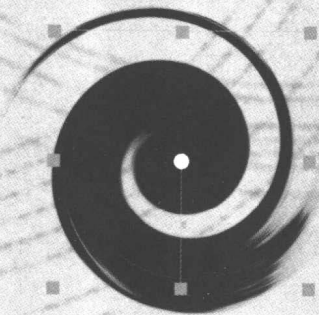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1世纪通识教育系列教材

中国传统哲学通论

ZHONGGUO CHUANTONG ZHIXUE TONGLUN

宋志明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传统哲学通论/宋志明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21 世纪通识教育系列教材)

ISBN 7-300-05858-2/B·345

I. 中...

II. 宋...

III. 哲学-中国-教材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3724 号

21 世纪通识教育系列教材

中国传统哲学通论

宋志明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密兴印刷厂

开 本 787×965 毫米 1/16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张 9.75 插页 1

印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77 000

定 价 1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出版说明

通识教育，有人称素质教育，也有人称博雅教育。无论如何称呼，其目的都是使受教育者不仅掌握必备的知识和能力，而且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健康人格，成为全面发展的创新人才。当代大学生应该具备哪些知识、能力和素质，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我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来看，大学生不论学什么专业，都应该是复合型的高素质人才，除了掌握某个专业的知识和技能之外，最重要的是具有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目前，从教育部到各个高校都充分认识到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重要意义。在教育部的倡导下，各个高校都开设了各具特色的通识课程。但是，课程不够系统，教材缺乏适用性，甚至没有教材的情况较为普遍，不利于通识教育广泛而有效地开展。

为了满足全国普通高校开设通识课程的需要，我们在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和对几十所大学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推出“21世纪通识教育系列教材”。其宗旨是拓宽学生的视野，扩大其知识面，提高其人文素养，塑造其科学精神。我们将陆续出版由兼具专业功底和教学经验的优秀作者编写的、涵盖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系列教材，为我国的人才培养服务，为高等教育服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哲学的精神	(1)
一、自强不息.....	(2)
二、实事求是.....	(4)
三、辩证思维.....	(7)
四、以人为本.....	(8)
五、内在超越	(13)
六、有容乃大	(19)
第二章 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	(21)
一、总体格局	(21)
二、发展阶段	(28)
三、主要问题	(34)
第三章 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	(37)
一、哲学基本问题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38)
二、天道与人道	(42)
三、天人合一	(46)

四、天人之辨评议	(56)
第四章 中国哲学的宇宙论	(59)
一、生成与变易	(59)
二、气化流行	(67)
三、天行有常	(73)
第五章 中国哲学的本体论	(80)
一、关于本体论	(80)
二、中国哲学本体论初探	(83)
三、本体的超越性：玄学与般若学	(87)
四、本体的本根性：华严宗与理学	(90)
五、本体的内在性：禅宗与心学	(94)
第六章 中国哲学的辩证思维	(99)
一、传统辩证法的类型	(99)
二、两一关系的理论研讨	(105)
三、传统辩证法的现代价值	(108)
第七章 中国哲学的知行观	(110)
一、重行的优良传统	(111)
二、知行关系的理论研讨	(114)
三、传统知行观的现代价值	(118)
第八章 中国哲学的价值观	(120)
一、传统价值观的总体取向	(120)
二、义利关系的理论研讨	(131)
三、内圣外王的操作模式	(135)
四、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换	(137)
附录 中国哲学家小传	(139)



第一章

中国哲学的精神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也是民族精神的精华，哲学的时代性和民族性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外国哲学史，掌握现代、当代国际哲学思潮的发展动向，归根到底是为了提高本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中国哲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两千多年以前，我们的先哲就创立了独特的哲学思维模式，创立了一个个独具特色的哲学理论体系，这标志着中华民族很早就进入了高度抽象的哲学思维阶段。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里，把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古希腊哲学并列为早期世界哲学的三大系统。与古希腊哲学相比，中国哲学不但毫不逊色，并且保持着更旺盛的生命力。古希腊哲学虽然有过辉煌的时代，然而却曾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走向衰微，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得以复兴；中国哲学则不然，它不仅“源远流”，而且“流长”，绵延数千年而从未中断过。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哲学同科学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在于它跟民族性有密切关系。科学同民族性的关系不大，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例如，数学、化学以及物理学等，全世界只有一个，没有必要区分什么中国数

学、美国化学、英国物理学……哲学则不然，它同民族性息息相关，法国哲学不同于英国哲学，英国哲学不同于俄国哲学。中国哲学跟其他民族的哲学都不一样，它浓缩地反映出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社会心理、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认知结构等，简而言之，它浓缩地反映出中华民族的特有传统。中国哲学的民族性也就是中国哲学区别于其他民族哲学的特质，这种特质构成了中国哲学独特的精神风貌。我们在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的时候，首先应当着眼于它的独到之处，把握它的精神实质。对于中国哲学精神实质的了解和掌握，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需要进行比较充分的材料积累，作扎扎实实的研究，“入乎其中，出乎其外”，形成自己的一种看法。我们对中国哲学精神实质的了解和掌握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何为中国哲学的精神？在中国哲学的研究过程中，这恐怕是一个常讲常新的问题，每个研究者都可以形成自己的答案。我们主张本着“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让各种学术见解都有表达的机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共识。我们认为，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下面几点：自强不息、实事求是、辩证思维、以人为本、内在超越、有容乃大。

一、自强不息

《周易·乾卦·象传》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最能体现中国哲学的积极进取意识。中国古代哲人崇尚健动，以动态的眼光看待世界、看待人生。在他们看来，宇宙是生生不息、流迁不止的运动过程，不存在任何一成不变的东西。孔子曾站在河边，面对奔流的河水发出感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他认为任何事物都像流水一样，永远处在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旧的东西灭亡了，新的事物又产生出来。宇宙永远保持着生生不息的活力。有的西方哲学家断言“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而中国古代哲学家却认为太阳底下总会出现新东西，他们叫做“变化日新”。《易传·系辞》上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一个“生”字最能体现中国哲学的特有风格。古希腊哲学家从“有”（存在）开始他们的哲学思考，中国哲学家从“生”（形成）开始自己的哲学思考。由于彼此的思路不同，古希腊哲学的理论思维成果是原子论；而中国哲学的理论思维成果是元气论。“气”与原子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既是宇宙万物的质料因，又是宇宙万物的动力因。这种动态的、有机的宇宙观是中国哲学的独到

之处。

中国哲学家立足于动态的宇宙观，也以“生”作为人类社会的最根本原则。他们高扬乐观主义精神鼓励人们积极进取，奋发向上。中国哲学教导我们，尽管人生的道路并不总是平平坦坦、一帆风顺，难免会遇到艰难险阻，但前途毕竟是光明的。按照《易传》的说法，总会有“否极泰来”的那一天。《易传》在解释六十四卦的卦序时指出，《易经》之所以把“未济”卦放在最后，就是表明发展、生化的无限性，帮助人们燃起心中的希望之灯。这种自强不息、刚健尚动、奋发进取的意识，无疑是中国哲学的精华。它代表着我们的民族精神，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繁衍、发展、腾飞起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它帮助中华民族渡过一道道难关，坚韧不拔地向着光明的未来迈进，永远对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中国哲学中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是先哲留给我们的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历来受到近现代先进中国人的重视。他们发扬中国哲学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从中汲取巨大的精神力量，投身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主义的斗争洪流之中。面对帝国主义列强伺机瓜分中国、民族危机日趋加深的严峻形势，他们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从未失掉中国革命必定胜利的坚定信念，从未失掉中华民族必能腾飞的坚定信念。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发动多次武装斗争，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但是，他毫不气馁，“至诚无间百折不回，……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①。孙中山的“百折不回，愈挫愈奋”的精神，正是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在近代的发扬。孙中山还把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同进化论思想结合起来，使之获得近代的理论形态。他认为天下之事并不仅仅是渐进发展着的，有的时候可以打破常规，后来居上。因此，通过我们的努力完全能够尽快的改变中国的落后局面，“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隆盛之地”。他坚信，中国必将会迎来“突驾”、“腾飞”的新时代。毛泽东把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起来，使之获得现代的理论形态，进而发展为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豪迈地宣告：

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

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

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②

在这种包含着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革命乐观主义的鼓舞下，无数革命先烈

^① 《孙中山选集》，第1册，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② 《毛泽东选集》，1版，第2卷，7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英勇斗争，终于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结束的时候，中国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獗。面对重重困难，党和人民并没有退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重新主持党中央工作，发扬大无畏的理论勇气，拨乱反正，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恢复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很快扭转了局面。他及时地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得到迅速的发展。在邓小平理论中，处处洋溢着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大力倡导“与时俱进”的精神，这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发扬。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必将焕发出新的光彩。

二、实事求是

与自强不息的进取意识相一致，中国哲学家特别关注现实问题，使传统哲学形成注重人生实践的品格。《汉书·河间献王传》称赞河间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这里“实事求是”一语恰当地概括出中国哲学注重实践的品格。西方哲学有“为知识而知识”的传统，哲学家研究理论问题、探求知识，只是为了弄清道理，满足求知的欲望，并不问这种知识是否有实际的功用。在西方，有“哲学源于新奇”的说法。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不同，哲学家并不从纯粹的理论兴趣出发探求知识，而是把“求是”即探求知识同“实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主张为“实事”而求知识，求那种可以解决实际问题的、实用的知识。

在中国哲学中，“实事”主要是指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古人把这些大事归纳为三条：“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左传·文公七年》）南宋学者蔡沈在注释《尚书·大禹谟》时，对三事作了具体的解释：“正德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听，所以正民之德也；利用者，工作什器，商通货财，所以利民之用也；厚生者，衣帛食肉，不饥不寒之类，所以厚民之生也。”所谓“正德”，就是端正价值观念，接受道德规范的约束，使人们养成良好的道德风尚，维系社会的秩序。所谓“利用”，就是发展生产，改进生产工具，促进商品流通，增加社会财富的总量。所谓“厚生”，就是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提高人

民的生活质量，使大家都能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尚书·洪范》把“实事”概括为“五事八政”。“五事”是貌（容貌）、言（言谈）、视（视察）、听（听受）、思（思虑），指的是执政者身心修养方面的事。“八政”是食（管理民食）、货（管理财务）、祀（管理祭祀）、司空（管理住行）、司徒（管理教育）、司寇（管理司法）、宾（接待宾客）、师（治理军务），指的是治理国家的方方面面的大事。《大学》在上述两种说法的基础上，列出四件大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哲学家非常关注这些大事，研究与这些大事相关的哲学问题，为处理好这些大事建言献策。同西方哲学家和印度哲学家相比，中国哲学家都有较强的关心国事民瘼的政治情结。

西方哲学讲究“为知识而知识”，形成了重知的传统；中国哲学关注实事大事，形成了重行的传统。“行”的原义是脚踏实地、走在路上。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行”的解释是：“行，人之步趋也。从彳（chì），从亍（chù）。凡行之属，皆从行。”从“行”的原义里可以引申出践履、行动、探索、活动等多种意思，用现代的哲学术语来说，这些意思就是实践。行包含着目的性，对于目的清楚了解和准确定位，就是中国哲学中的知。所以，中国哲学中的知并不是那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知识，而是与行、与实践密切相关的实用知识。这种知识来自实际，指导实际，故而中国古代哲学家往往把知与行相提并论，强调知必须落实到行动中。严格地说，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的那种认识论或知识论，有的是中国哲学特有的知行观。知行观讨论的问题，同认识论或知识论既有共同之处，也有明显的区别。

基于重知的传统，西方哲学家特别重视建立理论体系，重视概念的界定、逻辑推理和体系的建构；基于重行的传统，中国哲学家不怎么看重理论体系的建构，而特别看重理论的实践效果，看重作学问和作人的一致性。翻开中国哲学史，人们不难发现，中国古代哲学家没有像西方哲学家那样写出许许多多大部头的哲学专著，他们习惯于用短文、札记、书信、语录、注疏等形式表达自己的睿智哲思。他们当然有自己的哲学，不过他们的哲学往往不仅仅是表现在语言文字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他们的人生实践中。例如，孔子本人并没有写出什么大部头的宏篇巨著，只有弟子记载他的言行而形成的一部不到两万字的《论语》，然而他的言论却是后世儒家心目中的经典，他的行为举止也是后世儒家效法的楷模。孔子也因此而获得“世界文化名人”的盛誉。有些研究者常常用看西方哲学的眼光看中国哲学，指责中国哲学家的思想不够系统、不成体系。其实，应该被指责的正是他们自己，因为他们仅仅从语言文字等表现形式上着眼，用看待西方哲学家的眼光看待中国哲学家，没有从内容上把握住中国古代哲学家注重实践的

特点。如果我们不是停留在表现形式上，而是深入到思想实际中，就应当承认，注重实践恰恰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之一，恰恰是中国哲学值得发扬的优良传统。我们不能因为中国哲学不重视建立形式上的体系，而否认其实质上的体系。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中国古代哲学家们比较少作正式的哲学著作。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哲学史资料，大多是为别的目的而写的东西，或者是别人所记录的他们的言语，可以说是东鳞西爪。因此就使人有一种印象，认为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没有系统。如果是就形式上的系统而言，这种情况是有的，也是相当普遍的。但是形式上的系统不等于实质上的系统。”如果不承认古代哲学家有实质上的系统，等于不承认他们是哲学家，等于不承认中国有哲学，这显然是说不过去的。正因为中国哲学的这种特殊性，给我们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哲学史工作者的一个任务，就是从过去的哲学家们的没有形式上的系统的资料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找出他的思想体系，用所能看见的一鳞半爪，恢复一条龙出来。在写哲学史中恢复的这条龙，必须尽可能地接近于本来的哲学史中的那条龙的本来面目，不可多也不可少。”^①

中国传统哲学中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先哲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遗产，它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是息息相通的。毛泽东把中国哲学中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提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对“实事求是”作了新的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②毛泽东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上，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把它提升到新的理论高度；另一方面也用中国哲学的精华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进程。邓小平正确地把“实事求是”概括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他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推倒“两个凡是”，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找到了一条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比较落后、基础比较薄弱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江泽民同志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新时期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倡导“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也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贯彻。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1册，37～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② 《毛泽东选集》，1版，第3卷，8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三、辩证思维

与注重发展、注重有机联系的宇宙观相联系，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思维比较发达。正如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的那样：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的宇宙的哲学。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普利高津也有类似的看法。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极其丰富，关于变易发展、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物极必反、整体联系、生化日新等问题，历代哲学家都有相当精彩的论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已达到欧洲中世纪不可比拟的程度，它凝结着中华民族的聪明睿智，是先哲留给我们的一笔珍贵的思想遗产。

中国传统的辩证法思想以阴阳为基本范畴。关于阴阳范畴的来历，传说为伏羲所画，但不可确考。学者们的说法大致有三种。一种是两性说，认为阳是对男性特征的抽象，阴是对女性特征的抽象。另一种是蓍草说，认为古人用蓍草占卦，中间有结的蓍草为阴，中间没有结的蓍草为阳。再一种是山体说，认为山朝向太阳的一面为阳，背着太阳的一面为阴。我们觉得第三种说法比较贴切，同《易传》中“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意思比较接近。无论哪一种说法，都肯定了这样一点：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注意从两点论的角度看待世界，而不是从一点论的角度看待世界。以阴阳范畴为核心，在先秦时期形成三个辩证法学说系统。第一个系统是道家的“贵柔”辩证法，以老子为代表；第二个系统是兵家的“尚刚”辩证法，以孙子为代表；第三个系统是儒家的“执中”辩证法，以《易传》为代表。

先秦哲学家奠立的辩证思维传统为后世学者继承发展，形成中国哲学注重辩证思维的传统。几乎每个哲学家都不同程度地认同辩证思维，甚至在被视为“形而上学宇宙观”的代表人物董仲舒那里，也有辩证思维的闪光。他一方面主张“天不变，道亦不变”，另一方面也承认“王者改制”的必要性。他提出的“阴者，阳之和”的观点，他关于五行相克相胜的论述，也闪烁着辩证思维的火花。诚然，董仲舒是有形而上学的思想倾向，但不能把他等同于西方哲学史中以“孤立、静止、片面看问题”为特征的形而上学家。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的高僧都努力用辩证思维诠释佛教教义。在中国，最流行的佛教理论不是空宗，也不是

有宗，而是中观派。中国高僧试图辩证地解释空与有的关系、真谛与俗谛的关系、诸佛与众生的关系、菩提与烦恼的关系、生死与涅槃的关系、净土与秽土的关系、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关系，把印度佛教改造成为中国佛教。宋代以后，辩证法思想发展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哲学家们抓住辩证法的核心与实质，深入探讨两一关系问题，取得了许多新的理论思维成果。

了解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辩证思维传统，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辩证法是人类思维所固有的，主观辩证法不过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而已。这有助于我们深入地领会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中国传统的辩证法思想虽然尚处在自发阶段，而未达到自觉的程度，但其基本精神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是相通的。我们可以立足于现代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高度，继承发展中国辩证思维传统，提高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在这方面毛泽东堪称典范。他从中国古代哲学中找来“一分为二”的命题，重新加以解释，用来说明对立统一规律，遂使之成为具有崭新意义的唯物辩证法命题。由此可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开发中国古代的辩证法资源，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都具有不容忽视的促进作用。

四、以人为本

当古希腊的哲学家把目光投向自然、印度哲学家把目光投向超越的彼岸的时候，中国哲学家则把目光投向人类自身。中国传统哲学家十分重视人事论问题的研究，不太关心纯粹的自然哲学问题。中国古代哲人没有像古希腊哲学家那样写出许多《论自然》之类的专著。当然，中国哲学家也不是不涉及自然哲学问题，他们同古希腊哲学家的区别在于，他们探讨天或自然的时候，总是同人事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汉书·司马迁传》上说的“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中国传统哲学“以人为本”的传统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开始形成了。先秦时期的哲学家一般都把自然论与人事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没有把人同自然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儒家一向把人道作为理论研究的中心，不太关心宗教神学问题。子路向孔子请教鬼神问题，孔子回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向孔子请教关于死的问题，孔子的答复是：“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对于鬼神以及死后的情形，孔子讳莫如深，“敬鬼神而远之”，不愿意谈论怪、力、乱、

神之类的事情。他关心的是此岸，而不是彼岸，即应当怎样做人的问题。孔子以人为本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提出的“仁”的观念中。在一部篇幅不长的《论语》中，论及“仁”的地方就有一百多处。在孔子关于仁的多种解说中，核心的一条当属仁者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具体地说，爱人就是博施、济众。“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尤病诸！’”（《论语·雍也》）孔子主张关心人、尊重人、帮助人、爱护人，有一次，他家的马厩失火，孔子回家后首先问的是伤着人没有，并不过问马匹的损失情况。孔子把仁视为做人的终极价值目标，甚至把仁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生命诚然可贵，然而做人的道义比生命更为可贵。在需要为道义献出生命的时候，不敢挺身而出、贪生怕死的懦夫是可耻的，而那些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志士才是令人敬佩的。孔子的这种人生价值观包含着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倡导崇高的节操，对于中国人培养正义感曾发挥积极的作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伟人壮士都曾从孔子的人道至上的价值观中受到启发和熏陶。

孔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明确地提出人道原则，从而形成了儒学的一个基本特色。后世儒者纷纷把论证人道原则当作自己的宗旨。孟子认为，治理国家应当以民为本。在他看来，人民、社稷、君主三者之间的关系应当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就重要性而言，首先是人民，其次是象征着国家政权的社稷，最后才是君主。道理很简单，只有获得人民的拥护，国家政权才会具有稳固的根基；国家政权有了稳固的根基，君主的位子才会坐得住。孟子这种“民贵君轻”的民本主义思想，虽然没有达到以民权为核心的民主主义的高度，但冲击了君权神授的传统观念，表现出远见卓识的政治智慧。先秦另一位儒家大师荀子恰当地把君主和民众之间的关系比作船与水的关系，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君主好比是船，民众好比是水，水可以把船浮起来，也可以把船掀翻。荀子比孟子更透辟地阐发了“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他提醒那些掌权者说：“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君人之大节也。”（同上）掌权者要想坐稳位子而不翻船，必须处理好平政爱民、隆礼敬士、尚贤使能三件大事，牢牢地把握住以人为本的统治原则。荀子“君舟民水”的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影响很大，唐太宗李世民曾以此作为治理国家的金科玉律。

《大学》对孔子、孟子和荀子的民本思想加以总结，提出三纲领和八条目。

关于三纲领，《大学》在开篇写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这里，作者以极其简明的语句点明儒家的根本宗旨，即提高道德意识的自觉性，树立以民为本的观念，向往尽善尽美的理想人格。为了实现这三条根本宗旨，《大学》提出的具体方法和步骤是：“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三纲领和八条目是一致的，都围绕着治国以民为本、以修身为本这一主题展开论证，简洁明了地概述了儒家内圣外王统一、政治和伦理紧密结合的一贯思想。孙中山先生对《大学》以民为本、以德辅政的理论评价很高，称之为中国特有的“政治哲学”。他说：“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家都没有看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保存的。”^①在他看来，儒家的这种政治哲学相当完整，相当系统，相当有特色，相当有实用价值。他要求革命党人从中获得启发，把民国的政治建设同伦理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二者同时并进，相辅为用，相得益彰。他认为，要造就新的民国，首先应当造就出新的国民；有了新的国民，新的民国才会建立起稳固的根基。

在先秦，与儒家并称“显学”的墨家，也大力倡导以人为本的人道原则，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墨子指出，当时社会之所以存在着祸害怨恨、强欺弱、众劫寡、富侮贫、贵欺贱、诈凌愚等丑恶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以不相爱生也。”（《墨子·兼爱中》）倘若每个人都不是那么自私，而是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处处为他人着想，上述丑恶现象自然不会发生，世界将会成为另外一种样子：“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弟子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犹有盗贼乎？故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之身若其身，谁贼？故盗贼亡有，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故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亡有。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墨子·兼爱上》）

^① 《孙中山全集》，第1卷，6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